

欲望的囚徒

决策者参考文丛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中国书刊出版社

欲望的囚徒



决策者参考文丛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学术部 编
特约主编 周为民 周熙明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世界大势]

- 马尔萨斯的神话…………… [美] 李中清等(1)
- 格局决定结局 …………… 高希均(18)
- 第三世界的政治变革及其
 经济效应 …………… 畅征等(25)
- 未来世界的五大冲击 …………… [美] 格雷厄姆·莫利托(46)

[经济学家]

- 企业生命活力的真谛 …………… 戴树成(55)
- 网络经济, 谁能“泡”到最后 …………… 方舟(83)
- 硅谷的故事 …………… 钱颖一(94)

[思想库]

- 正常状态…………… [加] 伊恩·哈金(111)
- 理性与社会……………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25)
- 欲望的囚徒…………… [荷] 伊拉斯谟(143)
- 传统社会主义对市场社
 会主义的批判…………… [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164)
- 文明的断层与历史的板结…………… 辛向阳(183)

[盛世危言]

- 人满为患…………… [美] 保罗·艾里奇等(192)

中国缺水将动摇世界

粮食安全 [美] 莱斯特·布朗等 (212)

[中国人]

中国的国民性 林语堂 (232)

“中国的脊梁” 冷成金 (239)

被挤扁了的灵魂 王小明 (252)

“官场”文化 何天静等 (271)

余思或反思 季羨林 (291)

[人之初]

人性场 黎鸣 (301)

克林顿综合症探源 [美] D·莱文 (313)

怎样运用“贪欲” 谢选骏 (323)

[历史与人物]

宋子文舌战邱吉尔、斯大林 聂茂等 (333)

爱因斯坦与以色列 [英] 以塞亚·伯林 (359)

毛泽东、谭政与“谭政报告” 谈志兴 (377)

马尔萨斯的神话

〔美〕李中清 王丰

……在人类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生存资料的限制：只要生存资料增加，人口就必然增加，除非受强大而明显的抑制所阻止。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1986，315）

在每个社会或多或少不断起作用并使人口保持在生存资料水平上的抑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03/1992，23）

马尔萨斯的遗产

马尔萨斯的范畴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马尔萨斯相信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资源的限制。他大力宣扬的基本前提是，人口增长以食物为基础，人口政策对

社会福利至关重要。^①因此，马尔萨斯对由过去的人口增长政策到当代人口控制政策的转变作出了贡献。以前人口政策的制定者曾经认为人口越多国家越强。自马尔萨斯之后，他们开始担心人口越多，生活水平会越低。

第二，马尔萨斯还认为，在每一个社会中，两种抑制都限制着人口增长。在《人口原理》的第一版里，马尔萨斯强调了现实性抑制对减少人口规模的作用。这里包括所有导致人类寿命缩短的因素，它们可以归于一般死亡类型。在第二版和以后几版里，马尔萨斯详细描述了预防性抑制对限制人口规模的作用。这里包括所有的限制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它们因而可以归于一般生育类型。虽然马尔萨斯认识到死亡原因中存在广泛的差异，但他把现实性抑制的作用最终与生存经济和生存危机联系起来（1798/1992，42—43；1826/1986，314—315）。同样，虽然马尔萨斯认识到预防性抑制可以包括生育率的差异，但他认为预防性抑制主要是通过推迟结婚起作用，因为他认为“两性之间的激情”在任何年龄和任何社会里都几乎是不变的。^②

马尔萨斯将人类社会分成两类：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他在《人口原理》第二版及以后几版里，用了25章的篇幅论述过去和当时人口抑制的相互作用后，^③得出结论说：西方社会（他指的是现代欧洲）^④以预防性抑制为特征；非西方和非现代西方社会则以现实性抑制为主导。^⑤

换言之，在西方，个人理性创造了一种产生繁荣的社会经济的人口体系。婚姻与经济状况有很大联系。工资增长导致婚姻增多，而生育率上升又导致工资下降。个人根据经济状况和经济前景理性地改变婚姻行为，这种预防性抑制避免了人口过剩，使生活保持了高水平。其结果，不仅有一个相对平衡的人口体系，而且也有更加繁荣的经济。

缺少这种预防性抑制的其他社会都或多或少处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在某些社会中，人类创造力极为原始，土地又非常贫瘠，因此几乎从未有文明的发展。^⑥在另一些较先进的社会里，市场或财产权非常不发达，或者暴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于使资本难以积累，生活水平无法提高。^⑦即使在多数并非如此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过分鼓励婚姻也必然使人们生活在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⑧正如在西方社会中预防性抑制保证了繁荣一样，在非现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里，缺少预防性抑制便预示着贫穷。

其结果是，在马尔萨斯眼中，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饶同时也是最贫穷的社会。^⑨尽管中国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工业及其家长制政府使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提高到了惊人水平，但普遍结婚和早婚使得多数人的生活维持在生存水平，使穷人生活在赤贫状态。^⑩这种倾向因一种可分的继承权习惯而进一步恶化，这种习惯甚至使富人也会在几代之后衰败。^⑪

换句话说，人口无情地迫使中国滑向贫穷和更加贫穷。中国的生活水平以低工资和缺乏营养为特征。^⑫极度悲惨的生活使溺婴行为更为普遍，而它又反过来进一步鼓励了婚姻。^⑬虽然马尔萨斯承认贫困的增加与频繁的瘟疫无关，但他认为，即使在帝制中国的福利制度下，饥荒也是司空见惯之事。^⑭马尔萨斯的结论是：中国人口过程由现实性抑制而非预防性抑制所主宰。^⑮确实，他曾把饥荒看作是“对中国人口来说所有现实性抑制中最强有力的”（1826/1986，109）。

换言之，马尔萨斯是最早将现代西方社会与非西方和非现代西方社会进行比较，并将富裕程度的差距与特定的人口过程联系起来的社会理论家之一。^⑯他有关西方的富裕是推迟结婚的结果，而这又是西方个人主义和西方理性的产物的结论，不

仅对西方的社会理论家们，而且甚至对中国人自己，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随着世界人口及其贫富差距的增长，许多学者对马尔萨斯范畴作了扩充与修正。在西方，这种努力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造成了一种以单一因素阐明社会复杂现象的文化倾向。在中国，它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的基础，而目前也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西方神话

一批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著名社会理论家，阐述马尔萨斯范畴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意义，不仅是为了解释西方的人口过程，还了解西方人的获得欲，西方的社会流动，甚至西方的个人主义。

人口学家们特别强调人口转变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的个人选择的重要性。当然，这一思想来自马尔萨斯的预防性抑制理论。^⑦正如个人有自由和能力去决定婚姻一样，他们理性地运用这一责任，充分意识到他们行为的代价与后果，并能与其他机会相比较来权衡成本与收益。把这种精心计算扩展到生育女中，在生育率下降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不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60年生育率分析的理论经济模型，而且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生育行为所作的理论和分析模型，都明确表现出了这一点（Bulatao and Lee, 1983）。^⑧因而，“个人决策”的思想主导着西方学术界对生育率下降决定因素的解释。^⑨

与人口学家对个人主义的关注有些不同，一些人类学家认为，这种决策也需要与西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相适应。具体地说，他们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父母不愿意限制生育是因

为收入由孩子向父母一方流动。根据考德威尔（Caldwell, 1976）提出的这一理论，只有当财富的流向发生变化，变为由父母往孩子一方的向下流动（一种通常与大家庭被核心家庭所替代相关的社会革命），父母们才会开始限制其生育率。^③

的确，根据约翰·哈伊纳尔（John Hajnal）的更详细的理论，被马尔萨斯称为预防性抑制的推迟结婚制度是西方家庭体系的一部分，这种家庭体系的特征是周期性外出佣工（life-cycle service），推迟结婚，以及婚后独立家庭的组建或延续。在两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里，哈伊纳尔（Hajnal, 1965, 1982）确认了推迟结婚的确是西欧的普遍特征和西欧家庭体系的产物；并进一步将这种以周期性外出佣工、推迟结婚和独立居住为特征的西方体系，与以家庭劳动、早婚和普遍结婚，以及婚后居住在男方并通常是合住为特征的非西方体系进行了对照。如果西方体系以英国为代表的话，那么非西方体系则可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④

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或多或少受到哈伊纳尔理论的启发，将西方家庭体系追溯到12世纪，并因此认为马尔萨斯范畴既促进了后来的西方商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又增强了处于西方社会和西方道德中心地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决策的发展。根据这一逻辑，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78, 1986, 1987）最频繁地提出，“马尔萨斯革命”的一个坚定的原则是新婚夫妇在结婚时必须独立。^⑤结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个人所关注的心理、性和社会的需求。孩子是婚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而婚姻的基础是经济需要与心理和生理压力之间的协调。最重要的是，婚姻是一种选择并最终使个人满足，这一事实表明结婚的决定是与其他机会相比进行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结果。按麦克法兰的观点，马尔萨斯有意识地提倡一种婚姻

和家庭体系，它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然结果。资本主义兴盛之地，也必是推迟结婚和个人选择的文化的繁荣之乡（Alan Macfarlane, 1989, 322—323）。

这最后一种观点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近来一些决策者修正了这一新马尔萨斯公式，并提出“市场经济对个人主义的人口决策是必要的”这样一个观点。这并不奇怪，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芬克尔 Finkle, 1985）。在 1984 年墨西哥城世界人口大会上，美国改变了 1974 年布加勒斯特第一届世界人口大会上对人口控制的立场，极力宣扬“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避孕药”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至今影响广泛，即：一个“自由”的市场体系将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促成个人决策的文化。^②只有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下，个人才能承担繁殖的责任，考虑生育的成本和收益。

中国神话

正如西方学者在原马尔萨斯范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新马尔萨斯神话一样，中国学者使得将中国视为饥荒和贫困之地的马尔萨斯神话永远留存。何炳棣（Ping - ti Ho）关于 1400—1950 年中国人口史的不朽著作表明了马尔萨斯的影响程度。在改进我们对中国人口从 1400 年的 8000 万到 1950 年的 5.3 亿的增长及其环境的认识上，何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此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到 19 世纪初开始落入马尔萨斯陷阱。^③尽管现在普遍认为这种人口过剩发生的时间和过程在不同地区并不相同，但我们对这种“全国”模式的认识已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长久以来，中国学者为从 16 世纪左右以来人口持续增长

的马尔萨斯式的涵义所困惑。的确，几乎所有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过程认识的尝试都要考虑人口增长的影响。^⑤人们普遍同意，无论是促进还是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人口过程都起着决定性作用。^⑥一方面，在 18 世纪，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增长起初促进了生产、商业化和城市化；但另一方面，在 19 和 20 世纪，持续的人口增长最终导致了人均产量的下降及随后的贫困化。这个过程，在上升时是伯泽鲁普（Boserup）型的，而下降时是马尔萨斯型的（Boserup, 1965/1996; lee, 1987）。

许多学者力求进一步解释中国贫困的具体过程。根据他们对这些过程的描述，马尔萨斯剪刀的两片刃是：由于普遍结婚和对多子女——尤其是儿子——的基本需求导致的高生育率；^⑦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供给过多而导致的低工资。^⑧结果便是一些人所称的“技术停滞下的数量增长”（Elvin, 1973, Chao, 1986），和另一些人所称的“没有发展的增长”（Huang, 1990）。简而言之，劳动力过多阻碍了能够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发展，而这是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⑨农业衰退和人均生产率下降随之而来。随着马尔萨斯剪刀的并合，贫困和死亡率的上升便继之而起。

更进一步地说，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现实性抑制（即死亡率）是唯一调节人口与资源平衡的因素。其逻辑基本上与马尔萨斯相同：大家庭体系内的资源配置不仅保护婚龄不受短期波动的影响，也避免了资源压力不断增强的长期趋势对婚龄的影响。^⑩同样地，这种对大家庭的基本需求不仅能阻止夫妇为了适应短期波动而推迟生育，也能阻止夫妇为了适应长期的经济状况恶化而缩小家庭规模。这样，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强，只有死亡率发生波动，并伴随着灾难性后果，^⑪其中最常提到的例子便是人们所说的从 18 世纪后

期到 19 世纪后期中国的马尔萨斯危机。^②

然而，用马尔萨斯学说解释中国历史，在当代中国只是近来才变得流行。虽然一些中国的观察者认为马尔萨斯式的担忧早在 19 世纪初就出现了，但是这些担忧基本上得到了消除，尤其是在中国持续增长的条件下。^③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中国政府才开始在城市地区鼓励计划生育；^④直到 70 年代后期，才开始制定并执行强有力的政府控制人口政策。毛泽东及其接班人华国锋的基本理由是，1950 年以来，人口从 5 亿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10 亿，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未来很快又会翻一番。在邓小平时期，将人均生活水平尽快提高到世界强国水平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加强了这一政策。

目前中国的人口目标是到 2000 年将人口控制在 12 或 13 亿，这一指标是为了保证实现中国的生活水平到 2000 年翻两番，达到人均 800 美元的明确政策目标。^⑤为此制定和实行了世界历史上最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一。^⑥这一政策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引起某些人以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为借口而采取一些较极端的计划生育措施。总之，随着这种马尔萨斯担忧不断增强，人口控制已成为和改革开放同样重要的国策。在过去，尽管政府政策是鼓励生育，家庭往往根据经济现实来调整其人口行为，^⑦而现在政府则不顾一些家庭的反对来推行计划生育。^⑧

换言之，中国的领导人基于 19 世纪的社会理论发动了 20 世纪最大的计划生育项目。政府政策似乎完全接受了马尔萨斯范畴，而没有充分考虑它的后果。中国的贫困被认为主要是人口过剩的结果，这种解释是在缺乏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下被接受的。尽管后来中国的人口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我们对中国人口过程的认识也有了巨大提高，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计

划生育项目的理由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理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似乎很大程度上是专制的国家政策，而非个人理性决策的结果。由于一方面存在着这样一种政策，另一方面又缺少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因而中国的人口转变被看作主要是政府干预、不顾个人意愿和理性的强制性计划生育的结果，并且侵犯了个人的人权（Aird, 1990）。与此同时，尽管最近经济增长的崛起被归因于全球经济的介入及相伴随的技术转让和资本流动，中国计划生育项目成功的荣誉却仍主要被归之于中国政府的专制遗风。在中国，对控制生育的任何动摇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反现代的和非理性的。换言之，中国的人口转变被普遍认为是不同寻常的和不可替代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众传媒仍然在渲染中国庞大人口的马尔萨斯后果。尽管在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生育率出现了快速下降，中国仍然被认为是一颗潜在的马尔萨斯炸弹。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 1995）是最近一个渲染中国人口过剩的危险性的人。^⑧然而他的新观点并非指中国贫困的危险性，而是指中国繁荣带来的危险。布朗警告说，如果中国采取与其亚洲邻国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相同的发展模式，即增加食物需求和减少耕地面积，到2030年中国将面临3.69亿吨的粮食短缺，这相当于目前世界粮食出口的两倍（Brown, 1995, 97）。根据这一论调，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来不可想像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引起即便不是中国也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贫困。虽然这些言论似乎是错误的和夸大其辞的，^⑨但是它们重新引起了对马尔萨斯范畴的关注和对中国人口过剩的担忧。

环境保护主义者日益刺耳的马尔萨斯论调便因此产生了。他们认为中国很快就会出现能源、土地、水、甚至空气的短缺。中国仅仅因其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就要对全球污染和环境损耗负很大责任。然而，从人均水平来看并非如此，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污染程度和环境损耗率明显地要比中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Press and Siever, 1994）。无论怎样，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以及不断提高的人均污染，似乎都将加速环境退化、破坏和恶化，从而使一个“好的地球”变为一个“坏的地球”（Smil, 1984, 1993）。

尽管中国的财富有了迅速增长，尽管我们有关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知识有了迅速增加，但中国人口的马尔萨斯神话却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人们对中国生活水平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普遍认识，与对中国贫困和人口过剩的普遍印象可以共存不悖。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与中国的距离，一方面是由于对中国人口和经济的了解只是最近的事，因此人们对中国人口——包括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行为的心理和机制——目前的认识与马尔萨斯理论没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关中国的这种持久的，精心制作的西方神话，不仅表现在人口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一系列中国人的行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相同的似是而非的论调。在有关中国的经验知识近年来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我们有关中国的神话也同样在增加。在宣传上的危言耸听、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普遍无知的不幸结合煽动下，在种族中心主义的遗风鼓动下，把中国看作“异类”的神话主宰着我们的理性思维。^①其结果是教条的和蛊惑人心的宣传同时存在于太平洋的两岸。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总结过去和现在中国人口行为

的真实状况，着重阐述中国人口行为四个显著的特征：死亡率性别差异大、婚姻性别差异大、已婚生育率低以及收养率高。不过我们应首先看一下也许是所有中国人口神话中最经久不衰者——中国仅仅是一种糊口经济、一片饥荒和贫困的土地。

注 释

①虽然这一观点并非马尔萨斯首创，但他对其原理的精心构筑和在随后五版以及其他论文中对其重要性的反复论述，创造了一个使其知识遗产长存的范例（Overbeek，1974）。

②马尔萨斯（1803/1992，40；1826/1986，312）。马尔萨斯认为两性间的情欲高涨而恒常，婚内的性抑制是不可能的。他承认有其他种类的预防性抑制，包括一些非意愿性的形式，如与妓女接触带来的不育，营养不良导致的低生育等。最后，虽然他提到了一些避孕的方法，但他认为是不道德的和少见的，因为它们要么是他所称的非自然的性行为，要么是使用避孕器具。

③虽然马尔萨斯在这些章节里不知疲倦地陈述人种学和历史学的细节，引证大量资料，但他没有把具体行为划分为是现实性抑制还是预防性抑制。

④与他处理非西方世界问题时不同，马尔萨斯将他对西方世界的讨论按照地理位置安排：依顺时针方向从挪威开始，然后是瑞典、俄罗斯、中欧、瑞士、法国、英格兰，最后是苏格兰和爱尔兰。

⑤虽然马尔萨斯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他显然将这些章节按他对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人类文明的认识来组织，开始于火地岛，结束于希腊和罗马世界。在这些章节中还涉及到美国印第安人、南太平洋诸岛、古代欧洲北部的居民、现代畜牧民族、非洲、西伯利亚、土耳其领地和波斯、印度斯坦和西藏，以及中国和日本。马尔萨斯的明确结论是：“看来，与古代及世界其他文明欠发达的地区相比，现代欧洲对人口的现实性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1803/1992，43；1826/1986，315）

⑥例如，在马尔萨斯称之为“人类社会最低阶段”的火地岛，“其

居民仅仅依赖这些资源求得生存，在那里动植物食物来源极其匮乏，用劳动来获取也极其艰难，显然，人口分布必须非常稀疏以与土地相适应。”（1826/1986，24）

⑦例如在西伯利亚，“那儿玉米的市场很小，价格很低，农民总是很贫穷；尽管他们能够为全家提供充足的单一食物品种，但他们无法使资本在孩子间进行分割，使他们能耕种新的土地。”（同上，106）而在土耳其，“它的暴政、它的软弱、它的糟糕的法律和更为糟糕的执法，以及由此造成的财产不安全，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如此多的障碍，以致于生存手段必然每况愈下……向苏丹交纳的田赋并不重，但通过土耳其政府固有的弊病，帕夏（高级官员的称号）及其同僚找到了使其覆灭的方法……除了不断的压迫还有数不清的巧取豪夺……这种掠夺的后果是，几乎各地农民的食物都减少到了仅有一小块大麦或高粱面饼、洋葱、扁豆和水的程度。”（同上，110—111）

⑧例如，在印度，“婚姻受到很大鼓励，生育一个男性后裔成为最重要的目标……早婚的倾向一直占主导地位，并促使每个人进入这种状态，而预期维持一个家庭的机会极其微小。其自然的结果是低阶层的人们极度贫困，被迫采用最节俭、最紧缩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节俭被视为一种优良品德而进一步增强，并扩展至社会的较高阶层。人口因此被迫处于生存手段的极限，整个国家的食物以维持生存的最小份额分配给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利气候造成的每一次粮食歉收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如所预料的，印度在所有年份里都处于极为可怕的饥荒之中。”（同上，118—120）

⑨因此马尔萨斯强调了这一悖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贫穷和最悲惨的。”（同上，130）

⑩“对婚姻的超常鼓励……导致这个国家的巨大产量被分割成很小的部分，并由此使中国的人口增加得更多，按其生存手段的比例，或许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同上，128，另见126，130）

⑪“鼓励婚姻的后果对富人来说是分割财产，这成为一种强烈的促进人口增长的倾向……土地财产被分割为极小的块，一代又一代，每个父亲的财产在儿子中平均分割……其结果是财富不断地平均，很少有人

能够成功地把财富积累至可以自行增值的程度。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叫作富不过三代。”（同上，129—130）

⑫“各地的劳动力价格普遍与当地普通百姓能忍受的生活必需品数量一样低……它们被降低到只能购买蔬菜类食物和微乎其微的肉类食品。”（同上，130）

⑬“尽管中国人聪明勤奋，但其众多的人口却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一些人是如此贫穷，以致无法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他们不得不将孩子遗弃街头。”（同上，130）结论是：“关于实际被遗弃的婴儿数量，很难作出最简单的猜测；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中国作者，那么遗弃婴儿一定是很普遍的。”（同上，134）马尔萨斯显然认为，溺弃婴儿既是一种现实性抑制，也起了刺激婚姻的作用。“允许父母遗弃他们的孩子，毫无疑问会促进婚姻，鼓励人口增长。事先仔细考虑这一极端的办法，那么就不会对进入婚姻状态有多大畏惧。”（同上，129）

⑭“疾病对人口的现实性抑制作用尽管很大，但似乎并没有所预料的那么大。”（同上，133）相反，“饥荒在这儿太频繁，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在提到中国饥荒的频繁程度时，所有的作者都是一致的。”（同上，131，132）马尔萨斯还引用了一名耶稣会士写给一位皇家科学院成员的话：“另一件你简直不能相信的事是饥荒在中国会如此频繁……如果不是饥荒时不时将中国巨大的人数减少，中国不可能和平地生活。”（同上，135—136）

⑮马尔萨斯认为中国唯一的预防性抑制是和尚的独身（同上，132）。这样，他认为预防性抑制至少在当代中国的一个省——西藏——起着主导作用（同上，122—123）。当然，对马尔萨斯来说，西藏显然是南亚而非东亚的一部分。

⑯古迪（Goody，1996）详细讨论了这一西方比东方优越的更大的神话，尤其是马尔萨斯的贡献（190—191）。不过，虽然他用他书的1/6篇幅讨论了新马尔萨斯理论对这一神话流传至今的贡献，但他似乎没有过多强调马尔萨斯自己对这种种族中心主义社会理论的贡献。

⑰安斯雷·寇尔（Ansley Coale，1973）对这一马尔萨斯前提作了最新的修正。寇尔认为，生育率下降有三个前提条件：它必须在人们有意识